

社工服務與法令交互作用之反思

王惠宜

壹、楔子

96年9月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正式成立(民國88年成立任務編組),因有新增的職務,我受邀擔任秘書一職。因為是新的工作,所以抱著只要中心需要我的地方,我就盡力去做的心情。這兩年的工作,讓我有許多省思,引發我思考的原因部分來自我自身的經歷,我早期是一名兒少保護的工作者,後從事社區工作協助遭遇困難的家庭,我經歷過同時是助人者也是公權力的執行者,對於法令未完備及完備之後有深刻的感受。民國62年所頒定的兒童福利法,較屬宣示性的法條,後為因應社會環境變遷及兒童福利需求(民國76年解嚴,言論自由增加,媒體常有兒童受虐的零星報導,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則透過各縣市家庭扶助中心蒐集當年7月至12月間各地報章雜誌有關兒童虐待及疏忽的報導,發現有682件兒虐案件,證實國內兒童保護工作的迫切需求)(王行、仇立琪、黃元亨、鄭玉英,2004),而於民國82年修法,大幅擴充保護性措

施。具體化兒童保護工作相關規定,建立責任通報制度及緊急安置,為公權力介入兒童保護工作確定法源依據(內政部兒童局,2006)。又於87年訂定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經政府及民間團體的努力,兒童保護的保護網絡逐漸形成,於民國92年將兒童福利法及少年福利法合併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在兒少福法尚未修法的年代,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於78年設立兒童保護專線,開始執行兒童少年保護工作,鼓吹通報以能發現需要協助的孩子。當時未有公權力的範疇,也沒有一套處理流程,全靠社工員自身本領與家庭、其他服務系統在工作過程中尋找平衡。曾處理一件幼稚園通報的案例,當時幼稚園老師發現2個異卵雙胞胎與母親互動狀況明顯不同,再深入瞭解發現母親對於姐姐會特別嚴厲,甚至使用一些特別的方式訓練孩子,造成孩子身上有傷痕,老師基於社會局在推動兒保業務所以進行通報,但當我與老師聯繫時,老師則希望不要處理,因她們覺得母親很盡責但是卻不知為何對這個女兒會有這樣責

打的舉動，擔心我的介入反而造成母親很大壓力，對孩子並不是一件好事。當時爲了讓老師可以理解保護兒童的用意，自己一人力戰 5 名老師的質問，直到她們覺得我的介入瞭解是對孩子有幫忙，才願意讓我見到孩子，並聯繫母親可以和她討論所發現的狀況。每處理一件案件，都需要跟各系統奮戰，當時除了要面對父母的質疑外，這些工作系統也是我們在兒保工作上很大要解除的石頭。甚至修法後雖有緊急安置的權責，但要在學校安置孩子仍會有學校擔心父母的不良反應，堅持要求需要等放學後，孩子已走出校門始能安置，教育系統要面對家長的反彈壓力很大，的確需要有足夠的法令依據始能抵擋當時的社會文化。

所以，82 年修訂的兒童福利法增加了責任通報及未通報之罰責，並於 92 年併法增加相關網絡單位需要配合訪視調查處遇，因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家暴防治法的訂定，對保護工作開始有清楚的法令規定，讓我經驗到法令對於保護性社工有形無形的影響。而因 20 年前即從事保護性社工，也讓我不斷思索過去與現在的差別，有了法令的加持社工是否也有不同的形貌？我進入家防中心也開始真實地體察到防治中心這道對家庭規範的防線，是如何影響著我們所服務的個人及家庭與其他相關系統。

貳、責任通報的弔詭

兒童虐待疑似案例的通報，除了鼓勵

一般市民多管閒事，並規定某些專業人員有通報責任，乃是認爲孩童並無能力自動使用法律保護自己，而父母照顧者亦不會主動求助，因而需要別人代理發聲，專業人員成爲責無旁貸需爲其權益倡導。「另爲了能及早控制『疫情』、避免惡化的預防目的，則有賴專業人員發展出早期偵測及次級預防的技術，也需政府隨通報量之增加相對配置資源，以增加服務方能克竟其功」（余漢儀，1995）。責任通報制度經過十幾年來的不斷宣導，也裁罰過未通報的專業單位，甚至，內政部社會福利考核亦將通報的比率列爲評比的項目，各專業單位則積極將發現到的案件努力通報，尤以警政及醫療最爲徹底，目前家暴案件有九成是來自責任通報（兒少通報則以社福單位機構通報最多佔 6 成）。而兒少案件則常會因媒體報導而增加通報，曾經有燙傷的案例曝光，有的醫療單位則只要有燙傷的案件即通報，完全未經過篩選瞭解，因法令規範「知悉」即通報，但專業單位就其爲保護網絡的一員，是否該先行瞭解及就其專業判斷，才進行通報？過去宣導鼓勵通報，所有查證則由受理通報單位處理，而原處理的責任單位該有的協助，也因通報後靜候結果有可能會停擺。受理通報後需在 24 小時內進行瞭解，並於 4 日內提出調查報告，這樣的時間管控，主要希望確保孩子的安全。因此，社工的調查評估時間短暫，實需要各專業單位的協力評估始能讓案件可以較爲明朗。

當報紙刊登著孩子被父母不當對待致死，心中除了難過與痛心照顧者的狠心

外，關心的是這到底是哪個縣市的個案？如果是自己的縣市可能需要準備因應媒體相關的質疑，因為報紙定會順勢批判為何會發生這樣慘絕人寰的事件。而社工成為這暴力事件最主要的主角，是否有做到應執行的規定？並請學者一併批判為何該安置未安置，開始怪罪社工敏感度不足，而讓這樣的慘劇發生。而檢討聲浪中必會問到這是否曾被通報，通報的處理為何？因為媒體的關注，而法令也範定責任通報制度，相關專業單位只要遇到或發現個案有疑似受暴，即需要通報。就柯麗評在其論文中提到：「家暴防治法通報的責任也讓我頗為難。我不想通報因為認為事態沒有嚴重到需要通報，可是萬一更嚴重的暴力發生，我的判斷力是否會遭受質疑？」（柯麗評，2009）一語道盡其他專業單位的困惑，這個時機如不通報，以後發生問題就可能被究責當初為何未做通報。所以最保險的方式，只要發生或發現就進行通報，這是最能保全的方法。因為擔心未來大情勢的歸咎，社工及相關專業也就在這樣的設計中一步步走向家暴服務是一門專業，我通報你接手，你沒处理好就是你的責任，與我無關，因我已做了通報，所謂的責任通報責任了。

這仿如手上的燙手山芋，千萬不要在我手上發生問題，趕快丟給下一個人才是明智之舉。因為擔心社會輿論的責難，所以演變成相關專業單位只是一個聽到訊息轉通報的單位，專業單位把自己也視為「路人甲」般通報案件。曾有位教師在研習訓練中問我，因發現孩子被打，她已通報

113，她發現孩子身上有傷，詢問接下來她該做什麼？過去還未修法前，發現孩子有不明傷勢，不就該關心瞭解孩子發生的緣由，甚至協助醫療處理傷勢，這些很自然對人的關懷不需特別的訓練就在生活中自然的發生，但現在被認定為家暴事件，需要專業處理，因此，讓原本在服務的單位也搞不清楚他可以如何因應。

有些兒少個案原本即有相關社工單位在提供服務，但發現家庭不願配合而讓孩子的狀況沒有起色。所以，希望有公權力的單位可以介入處理，而通報家暴是他們會選擇的途徑。希望透過強制的公權力讓家庭改變，讓孩子的權利受到保障，所以，這樣的期待也被放置責任通報的使用中。但若未能妥善溝通，只想用通報的方式達到家暴服務的介入，通常也會有不如人願的狀況。我在與相關社工單位開會時，她們經常問我：「到底怎樣的個案你們才會受理？」「為什麼這樣的家庭你們評估不成案！」不成案三個字經常惹惱其他社工單位，難道對於家暴虐待的定義我們的訓練會相去十萬八千里嗎？甚且為了能讓家暴社工可以趕快出勤處理，其他社工單位願意花很多時間書寫事證，為的是證明這確實是一件要趕快處理的個案，你務必要受理並且成案（因就前面的理解我通報你受理要不要處理是受理單位的事，除非可以舉證讓受理單位覺得這事非同小可）。其實這些提問我經常是無言以對，不是我不清楚何謂虐待，而是我們用責任通報的方式來進行服務的連結這件事，確實是有問題。

對我而言，我只想真實地對這個家庭

及孩子提供確實的服務，而社工或其他相關單位（警政、醫療、教育）都是家暴防治網絡的成員，一個家庭進到這些體系，這些服務系統即需展開保護傘，每個系統都需曉得保護服務的精神，無非都是努力暴力不要再發生。當個案很信賴地與這些單位訴說他管教孩子的痛處時，如果我們只提供通報讓別的單位介入處理，這對照顧者而言是會產生很多憤怒不平。而家防中心又用另一套標準在衡量這個家庭，當符合這條線就進入服務，不嚴重或僅只一次的不當，爲了不讓家庭蒙上家暴的烙印，對家防中心而言反希望透過福利服務的提供讓家庭可以獲得實質的協助。而這些來來回回的調查評估，可能都不是通報單位真正想達到的目的。他要說的是這個家庭已服務很久，就是不願意依社工的安排讓孩子得到更好的協助，我需要一個扮黑臉的社工出面告訴家長這是不對的，趕快排除心中的障礙讓孩子獲得協助。

當我理解到責任通報把我們這些專業單位綁架時，我曾嘗試讓專業單位不是站在僅通報的立場，而是如何將「服務連續化」鼓勵他們直接對話而不是只寫通報單（目前與相關社工單位協調遇到需要兒少保護服務的個案以轉介的方式進行討論，而不要先花時間寫通報單，讓需要的服務可以儘速處理）。近2年的觀察，真正是虐待孩子的家庭比例不高，大多是貧窮及管教不當對孩子造成放任或嚴厲處罰，而這些家庭的確需要多重的服務才能真正對其有所幫助。有些單位先破心防讓家庭願意接受服務，後續並要跟進實質的服務提

供。所以善用家防中心公權力的角色讓家庭可以在勉爲其難中願意爲孩子作些許的改變（黃元亨，2001；林儀婷，2007）。而這樣的合作就不純然用責任通報來解決，專業單位間的合作空間需要創造，對家庭而言需要專業單位的攜手合作與願意和家庭共同面對他們的困難，而不只是站在父母該改變，卻不提供協助或陷在被通報背叛的情緒中久久不能釋懷。重點是從希望改變人（父母）轉變爲希望能獲得協助以幫助子女。對於多重問題家庭，社工服務單位間的合作協力才能讓家庭真實受惠，每個單位只談分工（分自己覺得可以做的部分）就不容易處理到家庭真正的核心。最近協助處理幾件對社工而言沉痾已久沒有進展的家庭，我們共同協力找出要工作的目標，並與家庭合力，再分別認養工作，對家庭而言可以清楚知道有哪些單位在提供服務，大家願意協助讓家庭可以變得更好，這樣的合作關係確實不是以「責任通報你處理的態度」來簡化社工整體的服務。

參、兒少保護調查的真正意涵

社工的服務角色多重，常需要因應不同的狀況彈性調整。而家暴防治法及兒少福利法賦予社工調查的職責，並且要求各相關單位及家庭需要配合調查，讓社工可以在短時間內蒐集資料評估案情。所以我們因應時間的規定需要在很短時間內完成一個案件的瞭解。有些家庭因爲孩子受傷狀況不詳，甚且需要醫療專業的協助判斷。這樣困難的調查工作，有時很羅生門，

需要時間的觀察才能知道真正的原因。而社工這樣的調查角色經常帶給家庭不舒服的感受。因時間的緊迫需要很快就下定論，所以我經常接到電話或相關陳情，控訴社工：「濫權，語氣傲慢，不加查證就妄下斷語」，來電的話語經常是三字經五字經連環炮。對我而言，這些憤怒的情緒我需要去化解，而不是當成瘋子罵人不加理會，因為我覺得家庭這樣的氣憤並不能帶給孩子福祉，而我們的介入也不是要帶給家庭痛苦，而是想引進資源協助。但是要如何帶著瞭解的眼光進入家庭，讓家庭不是感受到被調查而是感到被協助，我們有必要對「調查者」有新的觀點。

來到家防中心常讓我有種奇怪的錯覺，社工很像警察法官（事事求是），而遇到的警察法官卻很像社工（關懷瞭解），社工警察化的作為讓我有些錯亂。接到通報需要瞭解這些事證是否真實，且社工相信「真相只有一個」所以我們需要在事件中尋找各種蛛絲馬跡來求證這事件是否真實發生。而我們以處理「事件」來進入家庭，但是否能跳脫事件來進入家庭生活的脈絡，而不是定格在事件的處理上，這卻是很大的考驗。通常我們仍以事件來斷定是否屬於虐待，但家庭在我們問東問西的調查中感受到法眼的偵測，社工只會問問題卻無法提供具體協助（柯麗評，2009）。事件已經發生，我們如何防範未然，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不良的循環，過去的方法有何失靈之處，是否可以找出其他出路來改善現況，兒少保護社工需要對於自己的角色能夠自由挪移。為了進入家庭我們需要

家庭成員的合作，而合作並不是以強硬的手段要求配合或以法令為基調，他需要同理瞭解甚至自我揭露不良經驗來取得家庭成員的認同（林儀婷，2007；朱惠英、郭凡琦譯，2008）。而這樣的工作就不單是調查者，同時在進行觀念的導正與協調走向同一目標，所以社工需要有能力與這類非自願性案主工作的能耐。

面對照顧者的反駁、否認、淡化問題、氣憤被誣賴，有時會直接挑戰社工的個人特質如年紀輕、沒結婚、沒小孩如何理解照顧孩子及夫妻相處的各種困難。而家防中心的社工員的確如家庭成員的指述，我們有將近八成的工作者是年資五年以下，未成家占了大多數比例，但這樣的原罪是否可以有不一樣的做法讓家庭感受到社工的熱誠與善意。我發現調查者不足以轉化這樣的氣憤，需要有更體諒的心情站在家庭的位置與其對話。最近協助處理一位單親爸爸撫養五名子女（離婚的妻子與妻子女性朋友也都與單親爸爸同房而居），因長期的貧窮及社區的次文化，家庭擁有樂天知命的特性，但是看在社工眼裡卻是不積極改善現況，放任子女有各種不良行為（中輟、被性猥褻、性交易、打人），社工努力說服法官將 2 名少女安置，但家中還有 1 位升國中及 1 歲多的女兒。而這樣貧窮的家庭已在社福系統被服務 11 年的時間，希望家庭可以有改變的動力，所以家防中心的公權力是其他社福單位想要借重出手的重要資源。在與這個家庭的接觸，我發現單親爸爸天生天養的個性，讓孩子可能面臨經濟的危險，因為凡事遇到再處

理，沒錢再去借，這樣對生活沒有盤算的個性，的確會讓社福單位抓狂。但是，我要站在怎樣的立場讓單親爸爸意識到這樣的生活樣態需要改變，整個會談的過程一邊欣賞他的自由並肯定他對子女的愛，但光是好心是幫不了子女，我也和他談到我的擔心，也就是用了同樣方式帶孩子，孩子到了 12 歲一個個耐不了家的貧乏紛紛往外尋找刺激同伴，我們如何斬斷這樣的宿命可以有所不同，如何扛起父親的職責需要為孩子有點算計，協助孩子找到自己的才能發展，所以要做不一樣的爸爸。這是第二次會談，我們要開始發展共同的目標，並且要引進相關的服務，尤其對於長期貧窮，其就業、居住、醫療、教育都是要跟進的服務，如此不以審判者的態勢介入家庭，而是以協助、支持的服務協助改善現況（余漢儀，1995）。

所以轉化調查者的角色進入家庭，相信父母都是有意願扮演良好的親職角色，尋找與家庭共同的目標，社工員提供的處遇服務能與父母的主觀需求達成一致，對保護性的工作就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林儀婷，2007）。而會談時不斷的澄清角色（助人與監督）、辨識家庭利社會的言論及行為，給予鼓勵與同在一體（朱惠英、郭凡琦譯，2008），這些與家庭共同的心情，很多非自願性的家庭也都能感受到你的真誠與願意協助，改變的可能就有機會開始。因此，將兒少保護通報視為某些家庭遭遇困難需要服務之訊號，透過調查將涉案家庭與社區服務資源連結，兒少保護社工在瞭解的過程提供的是支持、協助而非烙

痕、處罰，也就不致有受害家庭的抱怨了（余漢儀，1995）。

肆、親職教育的運用

兒少福法對於違反兒少福利情節嚴重者得令父母照顧者接受 8 至 50 小時的親職教育輔導。台北市亦發展一套對於照顧者或父母需要的親職教育輔導課程。但是如何輸送這樣的服務給父母，讓他們接到時可以心悅誠服地去上課，卻是不容易的工程。大家都曉得教育只有在自己想要學習時才有效果，不然強制的教育，只是表面服從但骨子裡仍然有許多情緒在裡頭翻滾。因此，即便知道有一個很好的課程，但如果不能開啓學習的心門，這樣的服務仍然沒辦法達到效果。我看了一些同仁的評估報告，有些是評估父母的行為已經過當造成孩子身心的傷害，覺得需要再教育，即便父母不以為然，仍認為這樣的行為有必要處分，所以寫了報告要開處分書。但因為與父母關係並未建立，也很直接告知父母這樣的作為對孩子造成傷害。但是，發現有些父母有很大的憤怒，覺得社工並未看到他的努力，單憑一個事件就斷定他是不合格的父母。而我們提供的服務擺明就是要你就範，就是“你犯了錯，而我爲了你好，所以必需強迫你改掉不好的行為”。而這樣的“你錯－我對”模式，尤其和權力脫離不了關係（黃元亨，2001）。所以，很容易激怒父母以各種方式要來證明他沒有錯，尤其台北市的 1999 的市民熱線服務，成為這些父母每日一問

的最便利工具(市民可以打 1999 要求服務單位回應他覺得不妥適的服務)。

在社工的服務中需要思考這些家庭最適合的服務是什麼？曾看了報告詢問同仁：「明知提供服務的時機未到(因父母有很多憤怒)，是否繼續與其工作再伺機開處分書」同仁也直率回答：「親職教育輔導課程很好，所以想要提供給父母。」所以，常發現社工有良善的出發點，但卻不到位，以致發生許多額外的叉路需要處理。尤其面對大部分孩子都留在家中，怎樣讓孩子的照顧者願意一起來改變，學習新的方法，這部分的調節就不是落入你對我錯的模式中爭辯，而是能轉化進入孩子實質上如何被對待才有好的效果。通常我會問照顧者孩子這樣的行為用這樣的方式是否有效？這樣的狀態持續多久了？並且分享自己為人母的痛苦歷程，也同理其為了孩子用盡心思的不容易。但自己的經驗有限，自己也只有一兩把刷子辦法可施展，無法可施時我們可以有別的方式幫助自己。親職教育輔導最重要的不是處罰，不是堅持要讓父母或照顧者知道錯，而是能提供實質的改變方法給父母或照顧者。所以，為其量身訂做一套學習計畫，讓父母或照顧者感到可行願意嘗試才是重點。過去有同仁會用各種方式讓親職教育產生效果，教育的時數可能包括去參加學校家長會(可以抵時數)或是有人到宅訓練家事整理或是陪著孩子做早療復健等。

建立各種不同的親職教育輔導形式是重要，兒少保護的家庭有大部分是有經濟的困難與教養能力不足，所以，對於弱

勢家庭的服務設計本就不是一套四海皆準的服務可以涵蓋，雖然套裝服務有其快速性，但卻不是人人皆適合，怎樣進入家庭的脈絡中提供適切的幫忙，善用法令的強制性但讓家庭有其自由度商量如何進行這個再教育計畫，而我們這樣的示範不也讓父母可以學習到要達到目標可以有各種方式完成。這樣的討論才能讓父母感受到被尊重與被瞭解，而不是開一張處分書激憤父母不斷訴願—行政訴訟非要證明自己並未對孩子虐待。如果社工只想以簡單的法令規定要求父母或照顧者服從，也就複製了施暴的父母或照顧者的手法，我用硬的你就該聽我的邏輯裡，我想這並非是社工服務的本意。

基於以上的思維，所以，開始對父母照顧者說明接受新知能的重要，引發他們改變的動機，親職教育輔導的提供不純然以開處分書的方式，希望是以漸層的方式讓強度加大，故可先以開通知書讓父母先去嘗試，如發現勸說無效再以處分書處理。對於孩子仍留在家中被照顧更需要謹慎引用各種資源來協助，以期受暴狀況減低。

伍、以家庭為中心的婚暴服務

有天在中心大廳看到一對年幼的兄妹被爸爸丟到家防中心，問了同仁才知道是因為小孩的媽媽被庇護，而被稱為相對人的爸爸基於無法自行照顧，或氣憤，就把孩子帶到中心來。當時並未有社工主動與這名相對人工作，我們很努力保護所謂的

被害人，而被我們稱做「相對人」的施暴者，並不是我們首要服務的對象，尤其是在婚姻暴力的服務是以被害人服務為主體，被害人安全的考量是婚暴服務最重要的議題。但是，這一幕讓我開始思考家庭中除了被害人與相對人的主體外，孩子的主體該被放置在哪個位置。這對於從事兒少保護工作的我而言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之後陸續接到所謂的相對人及其家人打電話來理論社工偏頗，社工完全不理睬他的陳述，並且站在他是施暴者的立場和他說話。而對被害人的服務我通常稱之為服務三部曲：庇護安置－聲請保護令－離婚，脫離婚暴情境。但對於相對人卻鮮少處理，除非有核發保護令且有加害人處遇計畫，不然相對人這方是沒有服務單位主動處理，即便有進入加害人處遇計畫，服務仍是片段不整合。家防中心因為看到家庭的衝突只提供被害人服務是不足夠的，因此在 96 年開展相對人服務方案，希望直接面對相對人的需求提供合適的服務。

而我關注的焦點放在孩子的被照顧，夫妻雙方不合但如何減緩對孩子不當的影響。當自己帶著兒少保護的服務視框接觸我們所提供的婚暴服務時，自己也在思索什麼是以家庭為主體的保護服務。孩子的服務何時開啓？通常是離開的被害人發現孩子並未被妥適照顧自行通報相對人對孩子有兒保護題，或是相對人獨立照顧孩子但要求被害人要出面照顧。這些看似兒少照顧議題其實都隱含著婚姻暴力的衝突，因此兒少保護的服務就必須要更小心處理。因為家防中心設有相對人服務、婚暴

服務、孩子目睹服務（及兒少保護服務），如何整合這三種服務？首先這三種服務的工作者需建立一致「以家庭為主體」的服務概念，也就是保障家庭內成員（大人及小孩）的安全。並觀照家庭成員的需求，提供適切的服務。工作者之間需要建立信任關係，創造共同的教育訓練，增加對彼此服務領域的瞭解及信念。另為讓服務可以整合，目前亦建制跨組個案討論，定期討論合作的模式。

一個有多重問題情境的家庭可能有不同的社工提供服務。為讓服務的目標一致，則需進行整合資源團隊會議及網絡安全維護會議（尤其是面對加害人暴力威脅日益嚴重、被害人求助受限及保護性工作難以單打獨鬥，邀請家防官、家防中心、婚暴被害人社工、兒少保護社工、加害人處遇計畫帶領人、相對人服務社工等），共同討論服務的目標及方向，並分享相關資訊及分工，以達到社區暴力預防的功能，定期讓分段片斷的服務可以透過這些機制逐步建立較整合的服務模式（沈瓊桃，2008；內政部，2009）。

陸、結語

家暴防治法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的訂定與修訂讓社工服務進入家庭有其合法性的地位，怎樣妥適運用公權力並能與家庭建立合作關係確實考驗許多助人社工。要如何拿捏進入的姿態，是以關懷還是執法的態度？有時是需要左右夾攻，同時並用，既鼓勵也挑戰地進入非自願性的家

庭，並以利社會的示範來讓關係有所轉變。對於多重問題的家庭惟有專業單位的團隊合作才能讓家庭得到實質的幫忙，我們現有的服務分工精細但卻將家庭切割分化，整合這些服務單位共同合作也成了未來社工服務很重要的服務指標。有了法令的加持但需要更人性化地運用這些法令，

讓受服務的家庭感受到協助而不是受限制。我想這將是未來需要持續努力創造更多平台讓法令的真正精髓以社工的方式輸送到需要的家庭。

（本文作者現為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秘書）

📖 參考文獻

- 王行、仇立琪、黃元亭、鄭玉英(2004)。親職暴力處遇－介入與醒思。台北：心理出版社出版。
- 內政部兒童局(2006)。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指南。
- 朱惠英、郭凡琦/譯（Chris Trotter，原著）(2008)。如何與非自願個案工作。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沈瓊桃(2008)。婚暴併兒虐服務整合的挑戰與模式初探。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第12卷第1期。2008年6月。頁51-90。
- 余漢儀(1995)。兒童虐待－現象檢視與問題反思。巨流圖書公司出版。
- 林儀婷(2007)。施虐父母對公部門社工強制性處遇之主觀經驗及需求之探討－以肢體虐待與疏忽照顧為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柯麗評(2009)。當敘事、女性主義走入社會工作－再度遇見受暴婦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研究所博士論文。
- 黃元亭(2001)。不要破壞我的家－被認定為施虐父母之當事人對強制處遇介入經驗之探討。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